

· 域外汉籍 ·

《虚堂和尚语录》形成及日本流传考*

江 静 李 丹

内容摘要:目前通行的《虚堂和尚语录》是南宋禅僧虚堂智愚中日两国弟子、法孙历时半个世纪,三次编纂、共同完成的成果。在日本形成了五山版、古活字版、雕版刻本等多种版本以及以“抄物”为代表的数种注释本,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四卷本、所谓“七卷本”、十卷本等多种形式。《语录》在中国的流传并不久远,似乎也未得到广泛的阅读,最终至于散佚。在日本却广为流传,并形成了多种翻刻本和训释本。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禅宗在日本的蓬勃发展有关,也是智愚在日本的法脉“应灯关派”长期在禅林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

关键词:《虚堂和尚语录》 虚堂智愚 版本 日本流播

《虚堂和尚语录》,又称《虚堂禅师语录》《虚堂智愚禅师语录》《虚堂录》《虚堂语录》,收录了南宋高僧虚堂智愚禅师(1185-1269)^①住持嘉兴府(治今浙江嘉兴)兴圣禅寺、报恩光孝禅寺,庆元府(治今浙江宁波)显孝禅寺、瑞岩开善禅寺、万松山延福禅寺,婺州(治今浙江金华)云黄山宝林禅寺、庆元府阿育王寺、柏岩慧照禅寺,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净慈寺、径山兴圣万寿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代中日佛教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9ASS007)的阶段成果。

①虚堂智愚,俗姓陈,号息耕叟,明州象山(今浙江象山)人。运庵普岩(1156-1226)法嗣。相继住持浙江嘉兴、宁波、义乌、杭州等地的十所禅寺,受宋理宗、宋度宗归依。法嗣有灵石如芝、闲极法云、宝业道源、禹溪一了及日僧南浦绍明、巨山志源等。其事迹详见《虚堂和尚语录》卷十《行状》。此外,《补续高僧传》卷十一、《增集续传灯录》卷四、《径山志》卷二、《释氏稽古录》卷四、《佛祖纲目》卷四十、《五灯全书》卷四九亦有其小传。

禅寺等十所寺院时的法语、偈颂、序跋等。管见所及,国内仅国家图书馆藏有该语录的江户时代和刻本。而在日本,《虚堂和尚语录》被认为是中世临济宗最广为阅读的语录之一^①,也是日本临济宗最为重视的七部典籍,即所谓的《七部录》^②之一。因此,版本不少,藏本亦多。仅“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③检索结果显示,除去《大日本续藏经》和《大正藏》收录本,日本各地有相关藏本 21 件。

关于这部语录的基本情况,日本多家收藏该书的图书馆,如驹泽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等都有或详或略的介绍,日本的《佛书解说大辞典》^④、《新版禅学大辞典》^⑤亦有著录,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日本古典籍総合目録データベース”提供了部分藏本的简要信息。中国方面,《丁福保佛学大词典》、《佛光大辞典》、袁宾《禅宗大辞典》等辞典有著录,傅增湘(1872-1949)较早介绍了该语录的江户活字本信息,严绍盪、李国玲、陈雷等人在相关著述中有详略不等的说明^⑥。上述工作有利于我们了解《虚堂和尚语录》(以下简称《语录》)的版本、收藏等情况,然而,也存在以下问题:1. 提供信息不全或有错误;2. 对于《语录》在日本的流传情况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3. 关于《语录》卷数的说法不统一,有四卷本、七卷本、十卷本三种,彼此关系不明确。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对《语录》各版进行搜集与考察的基础上,梳理其在日本传播的基本脉络,并纠正学界一些错误的认识。

一、《虚堂和尚语录》在南宋的刊刻

据智愚嗣法弟子闲极法云咸淳十年(1274)所作智愚《行状》及咸淳五年

①日本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第 27 册《诸宗部(三)》,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83 年,第 8 页。

②《七部录》指《碧岩录》《临济录》《大慧书》《虚堂录》《五家正宗赞》《禅仪外文集》《江湖风月集》。

③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

④小野玄妙:《佛书解说大辞典》第二卷,大东出版社,1932 年,第 229-230 页。

⑤驹泽大学内禅学大辞典编纂所:《禅学大辞典》,大修馆书店,1985 年,第 205 页。

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中华书局,2009 年,第 882 页。严绍盪:《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414-415 页。严绍盪:《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329 页。李国玲:《宋僧著述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48 页。《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第十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 页。陈雷整理:《虚堂和尚语录》,董平主编:《杭州佛教文献集萃》(第一辑)第九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 4635-4639 页。

版《语录》题识,《语录》在南宋经历过两次编纂。

第一次是在虚堂智愚在世时,法云称“语录二帙,已行于世”^①。至于完成的具体时间,根据下文妙源题识中所谓“观师十会语”,应该是在智愚住持第十座寺院径山寺之后,即咸淳元年(1265)八月以后。

第二次是在咸淳五年(1269)十二月之后。该版本卷尾有妙源的题识,内容如下:

妙源尝拜观师十会语,如南屏、双径,提唱甚多,惜乎未尽铍梓。曩曾侍师于凌霄,因有此请,不允。今丛林衲子咸欲流传,谨录成后集。倘览者言外知归,则我师之语何剩焉?

咸淳五年,岁在己巳,佛成道日,新差住持、福州鼓山嗣法小师妙源拜书。小师楚苹清塞谨抽衣资,命工刊行。^②

妙源(1207-1281),明州象山(今浙江宁波象山县)人,俗姓陈,字晋之,号宝业,智愚嗣法弟子。智愚住持径山期间,他随侍智愚身边,并曾代为演法酬答,后相继出任泉州承天寺、福州鼓山涌泉禅院住持。《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一《定水源禅师塔铭》、《补续高僧传》卷十二有其传。此份题识完成于他住持涌泉禅院后不久。

根据该题识提供的信息,此前编撰的语录没有将智愚住持净慈寺和径山寺期间的法语收录完整,对此,妙源深感遗憾,他在径山寺凌霄庵侍奉智愚时,曾请求将语录增补刊行,未得到后者的应允。咸淳五年(1269)佛成道日(十二月初八),即智愚去世两个月后,因“丛林衲子咸欲流传”,智愚弟子们完成了《语录》续集的编纂,妙源为此题写了上述识语。此版语录的出资者是“楚苹、清塞”,关于此二人,目前查不到更多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法云在《行状》中只提到“《语录》二帙”,并未言及语录的卷数。日本正和二年(1313)本刊记中称“宋咸淳五年,晋之续录后集,已成三卷”^③。日本天文三年(1534)景聪兴勛《虚堂录抄》序言提到“此语录素不定卷之数焉,后人分之,而为上中下之三卷矣”^④。由此推测,《语录》在首次刻版时并未分卷,在再次刊刻之前,被分为上、中、下三卷。

①妙源等编,陈雷整理:《虚堂和尚语录》卷之十,第4889页。为方便读者查阅,本文《语录》引文文字若与言及版本没有不同,皆出自此版本。

②妙源等编,陈雷整理:《虚堂和尚语录》卷之十末尾,第4880-4881页。标点略有改动,下同,不再出注。

③妙源等编,陈雷整理:《虚堂和尚语录》卷尾,第4889页。

④景聪兴勛:《虚堂录抄》,古田绍钦编:《松ヶ岡文庫所蔵禅籍抄物集》,岩波书店,1977年,第3页。

《语录》的南宋刻本在中国可能已经不存,据严绍盪调查,在日本还保存有两部南宋刻本,皆为四卷本,分别藏在御茶之水图书馆(今石川武美記念图书馆)成篁堂文库和宫内厅书陵部^①。但据川濑一马所作该本解题以及作者的实地调查,严先生所言成篁堂文库藏本实为咸淳五年刊本的递修本。全书有大量的头书^②、旁注及朱墨色逗点,有多人补写及重新装裱的痕迹。川濑一马推测补写时间是在16世纪后半叶的室町时代末期,装裱者恐为妙心寺塔头蟠桃院^③。至于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严先生并未介绍。根据笔者的调查,书陵部仅有正和二年覆刻本,并无南宋刻本,不知严先生依据何在。

根据成篁堂文库藏本以及日本正和二年覆宋刻本,可知咸淳五年本凡四卷,各卷目次如下:

卷上 兴圣 报恩 显孝 瑞岩 延福 宝林
卷中 育王 柏岩 净慈 径山 法语 序跋 真赞 普说
卷下 颂古 代别 佛祖赞 礼祖塔 小佛事 偈颂
后录 续辑 净慈 径山 偈颂 小佛事 语跋 真赞

前三卷系初刻本内容,完成于咸淳元年(1265)智愚住持径山寺后不久,收录了智愚住持兴圣禅寺、报恩光孝禅寺、显孝禅寺、瑞岩开善禅寺、延福禅寺、宝林禅寺、阿育王寺、柏岩慧照禅寺、净慈寺、径山寺期间的语录,并法语、序跋、真赞、偈颂等。咸淳五年再刻本增加了“后录”一卷,补充了初刻本未收的语录,特别是智愚住持净慈和径山期间的语录以及后来出现的偈颂、法语、像赞等。

《语录》各部分的编者,皆为智愚的弟子或侍者,包括妙源、可宣、无隐等,凡参学13人,侍者15人。

二、《虚堂和尚语录》东传与五山版的问世

京都妙心寺住持龙溪宗潜(1602-1670)在《虚堂录抄》序文中说道:“昔吾南浦始祖遥入宋域,敲磕禅师之门,亲受儿孙日多之记,兼赍此录而归。”^④无著道忠(1653-1745)在《虚堂录犁耕》总论中也提到“此录南浦和尚携来”^⑤。一般认为,《语录》是由南浦绍明带回日本的。

①严绍盪:《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第414-415页;《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329页。

②所谓“头书”,指写在天头部分的注释文,是日本比较常见的注释形式。

③川濑一马:《お茶の水図書館蔵新修成篁堂文庫善本書目》,(財)石川文化事業財團お茶の水図書館,1992年,第943页。

④《虚堂录抄》序文,日本万治元年版,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

⑤无著道忠:《虚堂录犁耕》,禅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页。

南浦绍明(1235-1308),俗姓藤原,骏河国安部郡(今静冈市)人,虚堂智愚法嗣。十五岁出家,后受具足戒,赴镰仓,随建长寺住持、赴日宋僧兰溪道隆(1213-1278)习禅。日本正元年间(1259-1260)入宋,遍访高僧后,拜虚堂智愚为师。咸淳元年(1265),智愚入主径山寺,绍明随师前往。咸淳三年秋,绍明辞师下山,翌年五月底六月初归国。回国后,先是在建长寺兰溪道隆会下任藏主,后相继住持筑前(今福冈县一带)兴德寺、崇福寺,京都万寿寺,镰仓建长寺等。日本延庆元年(1308)圆寂,谥号“圆通大应国师”,有《大应国师语录》存世。绍明法嗣众多,其中以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1282-1337)最为著名,妙超弟子中,又以妙心寺开山关山慧玄(1277-1360)影响最大,他们三人的法系被称作“应灯关派”,是日本临济宗的主要流派,法脉流传至今^①。

绍明回国是在咸淳四年,而《语录》在南宋的增补刊刻是在咸淳五年十二月之后,也就是说,绍明携归日本的,只是南宋版的初刻本。至于再刻本是何时由何人传入日本,尚不知晓。

日本正和二年(1313),京都龙翔寺住持绝崖宗卓(?-1334)完成了《语录》在日本的初次刊刻。此即通常所说的“五山版”,本文称“正和二年本”。

绝崖宗卓,南浦绍明嗣法弟子,历任筑前崇福寺、京都万寿寺、京都南禅寺、镰仓净智寺住持。日本延庆二年(1309),开创京都龙翔寺,奉南浦绍明为劝请开山。

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正和二年本凡四册,四卷,目录如次:

卷上六十七纸 兴圣 报恩 显孝 瑞岩 延福 宝林

卷中五十四纸 育王 柏岩 净慈 径山 法语 序跋 真赞

普说

^①有关南浦绍明最早且最详细的传记是杭州天历永祚禅寺(中天竺寺)住持用章廷俊(1299-1368)撰写的《圆通大应国师塔铭》。关于绍明生平思想的研究,另可参考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376页;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思文阁出版,2003年,第535-538页;佐藤秀孝:《虚堂智愚と南浦绍明—日本僧绍明の在宋中の動静について》,《禅文化研究所紀要》28号,2006年,第15-43页;野口善敬:《大応國師—日本臨濟禅の宗祖—》,大応國師と崇福寺展実行委員會編:《大応國師と崇福寺:大応國師七百回忌記念特別展》,非卖品,2007年,第9-20页;许红霞:《日藏宋僧诗集〈一帆風〉相关问题之我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3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50-166页;陈捷:《日本入宋僧南浦绍明および宋僧の詩集『一帆風』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海域叢書13 蒼海に交わされる詩文》,汲古书院,2012年,第119-146页等。

卷下七十五纸 颂古 代别 佛祖赞 礼祖塔 小佛事 偈颂
后录八十一纸 续辑 净慈 径山 偈颂 小佛事 语跋 真赞
新添

与南宋刻本相比,第四卷最后增加了“新添”内容,编者署名为“敕差住持洛阳万寿法孙比丘宗卓集”。

全书卷末有宗卓所撰刊语,全文如下:

祖翁在世,语录二帙刊流天下。宋咸淳五年,晋之续录后集,已成三卷,而本朝未刊行之。先师常为言,而未果成也。为人之后者,曷无勇为乎?仍搜遗逸,新添数纸于后录之尾,侵梓于龙翔。正和癸丑开炉日,拙孙宗卓敬书。沙弥宗哲等施财开版。^①

根据此刊语,绍明在世时虽有在日本刊刻先师语录的夙愿,却始终未能实现。绍明辞世五年后,弟子宗卓“仍搜遗逸”,在南宋刻本的基础上增加《新添》部分,完成了先师的遗愿,此事得到绍明另一位弟子宗哲的资助。

《新添》内容包括图赞、偈颂、法语、信函、智愚行状等,相比之前的内容,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收录内容多有题款,标明时间、地点、创作缘由等。例如,在十二则《赞禅会图》的最后有“绍定四年清明日,住嘉禾兴圣智愚为妙源侍者敬赞”之语;在《赠禅客智仁》后题有:“问话行者智仁炷香请语,以此赠之。景定癸亥至节,虚堂老僧书于雪窦西庵。”在《鸣钟佛事》法语后题有:“化城鸣钟。咸淳戊辰冬十月日,住径山虚堂智愚书。”^②题款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研究智愚的活动轨迹。

《新添》中还有一些颇为重要的内容,如智愚为南浦绍明题写的饯行偈《送日本南浦知客》、给法嗣无示可宣的回函《答蓬莱宣长老书》、去世前留下的遗偈《辞世颂》以及闲极法云所作的智愚《行状》等,皆是研究智愚思想、生平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行状》,对智愚的生平记载颇为详细。《行状》作者法云(1215-?),号闲极。智愚住持宝林寺期间,法云就在其门下担任侍者,后又在智愚会下任首座一职,最终嗣法智愚,是《语录》中《婺州云黄山宝林禅寺语录》《双林夏前告香普说》的编者。《行状》末尾题款曰:“咸淳十年十月十一日,新札差住持庆元府清凉禅寺嗣法小师法云谨状。”交待了法云当时的身份以及《行状》的创作时间。法云与智愚的关系决定了他对后者的经历比较熟悉,相关记载有较高的可信度。

《行状》末尾有宗卓的注语,曰:“《行状》或唐刊系在《后录》末,今本不

①妙源等编,陈雷整理:《虚堂和尚语录》卷尾,第4889页。

②上述三则题款分别引自妙源等编,陈雷整理:《虚堂和尚语录》卷十,第4883、4884、4885页。

见,故付于此。”^①然而,《后录》是咸淳五年再版时增加的内容,《行状》完成于咸淳十年,不可能被《后录》收录。

可以想象,宗卓辑录的《新添》诗文有部分来自其师绍明的珍藏。咸淳三年绍明打算回国之际,除了智愚,另有诸多禅友法眷为其作诗送别,这些诗文被绍明携归日本。日本宽文四年(1664),曹洞宗僧轮峰道白(1636-1714)在京都某寺发现了一部名为《一帆风》的诗轴,收录了上述饯行诗凡44首,遂将之刊刻流布^②。《一帆风》的第一首便是智愚所作《径山虚堂愚和尚送南浦明公还本国并序》,与《新添》收录的《送日本南浦知客》题名虽然不同,内容却基本一致,只是,《新添》本诗在前、序在后,且文末有“咸淳丁卯秋,住大唐径山智愚书于不动轩”题识,交待了创作时间和地点,颇为重要。《新添》中也有一些诗文作于绍明归国之后,应该是来往于中日间的其他僧人带到日本。

正如川濑一马指出的,除了《新添》,正和二年本其余部分为覆宋刻本^③。日本现存的正和二年本至少有十种,分别藏在宫内厅书陵部(二种)、尊经阁文库、成篁堂文库、东洋文库、石井氏积翠轩文库、国立国会图书馆、大东急纪念文库、三井家、松元研次郎家等处,除尊经阁文库藏本,其余诸本皆为修补本。就品相而言,最佳者为宫内厅书陵部藏的其中一种本子^④。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虽是室町时代补刊本,但品相良好,修补内容较少,比较忠实地反映了版本原貌,影印本见于国内近年出版的《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第十册。

正和二年本《语录》补充了南宋版未收的内容,使《语录》内容更趋丰富和完整,有助于我们对智愚生平及思想的研究;正和二年本《语录》的问世使

①妙源等编,陈雷整理:《虚堂和尚语录》卷十,第4889页。

②关于《一帆风》的研究,主要有陈捷:《日本人宋僧南浦绍明与宋僧诗集〈一帆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5-99页;侯体健:《南宋禅僧诗集〈一帆风〉版本关系蠡测——兼向陈捷女史请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第15-17页;许红霞:《日藏宋僧诗集〈一帆风〉相关问题之我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3辑,第150-166页;陈捷:《日本人宋僧南浦绍明および宋僧の詩集『一帆風』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海域叢書13 蒼海に交わされる詩文》,第119-146页;衣川贤次:《送別詩集『一帆風』の成立過程》,《駒沢大学禅研究所年報》第25号,2013年,第149-162页等。陈捷的上述两篇文章及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一《诗轴集成》(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925-930页)收录了《一帆风》的诗文。

③川濑一马:《五山版の研究》,古书籍商协会,1970年,第364页。

④川濑一马:《五山版の研究》,第365页。

得日本禅林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语录》，促进了《语录》在日本的流播，此后日本出现的多种《语录》皆以此版为祖本。在宋版《语录》已然难见的今天，作为覆宋刻本的正和二年本，可帮助我们了解《语录》的原貌。

三、《虚堂和尚语录》抄物的出现

所谓“抄物”，是指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3）中后期至江户时代（1603-1867）早期，五山禅僧及通晓儒学之人对中国古籍、佛教经典和日本古典进行注释的书籍，多为讲义和听课记录的整理。其中既有“真名抄”，即汉文注释本，也有“假名抄”，即汉文假名混用本。“至今保存的抄物数量颇大，内容有繁有简，既有文言为主的，也有接近口语的，既有讲述者亲笔书写的，也有听讲者笔录的”^①。

《语录》传入日本后，成为禅林阅读和讲授的对象。由于早期的抄物多已散佚，本文仅介绍景聪兴勘的《虚堂录抄》。

景聪兴勘（1475-1563），赐号大鉴普应禅师，临济宗妙心寺派玉浦宗珉的法嗣。担任妙心寺首座期间，应请出任美浓汾阳寺（在今岐阜市）住持。永正年间（1504-1520）开创道树寺（在今岐阜县美浓市，属临济宗妙心寺派），参徒常达百余人。他常年为僧众讲解《碧岩录》和《语录》，并“错综诸录，著注钞若干卷”^②，包括《虚堂录抄》、《碧岩录抄》等。

《虚堂录抄》对《语录》的注解颇为详尽，涉及《语录》的字、词、句，既包括人名、地名、寺院名、官职名、文书名等专有名词的解释，也包括佛教用语、俗语词等难解字词的训释，还有对句子格式、文章含义的解读，内容颇为丰富。

《虚堂录抄》至少有两个版本：天文三年（1534）本和永禄元年（1558）本，皆为写本。

神奈川县镰仓市松冈文库藏有天文三年本，十卷六册。古田绍钦认为，其注释底本为正和二年本^③。值得关注的是，正和二年本为四卷本，此抄物则为十卷本，卷目与后来出现的十卷本卷目同，我们虽不能断定这是十卷本出现之嚆矢，但是，可以想见，因为抄物夹杂了大量的注解，内容较多，卷数

①王晓平：《抄物识读的方法》，《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6期，第86页。此外，刘玲《〈三体诗幻云抄〉等日本室町时代抄物写本书写符号的识读》（《文献》2016年第3期）引言部分亦有关于抄物资料的概括性介绍。

②卮元师蛮：《延宝传灯录》卷三〇，《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8册，佛书刊行会，1921年，第404页。

③古田绍钦：《松ヶ岡文庫所蔵禪籍抄物集・解題》，第3-17页。以下所述古田绍钦关于《虚堂录抄》的研究皆来自此解題，不再出注。

遂由原来的四卷扩充到了十卷。第六册卷尾有如下识语：

此臆断撮合诸尊宿之讲义，为小师等书之者数岁也，兹天文三年甲午小春如意珠日于道树精舍书毕矣。拙僧兴勳年五十九也，伏愿因之令法久住，(至)祝至祝。^①

此段识语交待了该抄物完成的时间、地点以及作此抄物的目的。其中提到的“撮合诸尊宿之讲义”说明兴勳曾参考过多名高僧的抄物。据古田绍钦的研究，景聪兴勳在作《虚堂录抄》时，参考过一山一宁、约翁德俭、绝崖宗卓、日峰宗舜、义天玄承、雪江宗深、悟溪宗顿、玉浦宗珉等多位高僧^②的抄物。上述高僧中，后五位僧人为五代相承之师徒关系，皆曾担任妙心寺住持，师承玉浦宗珉的景聪兴勳与他们出自同一法脉。

然而，古田绍钦认为，松冈文库藏此本并非景聪兴勳的手稿，而是后人的摹写增补本，大致完成于庆长年代（1596-1615）末、宽永年代（1624-1643）初，其中至少有三人补注、校订的痕迹。

兴勳晚年仍在道树寺讲解《语录》，东京大学藏永禄元年（1558）《虚堂录抄》的抄本^③说明了这一点。该本识语有“景聪和尚行年八十三，于浓之小山道树精舍讲之，永禄元年四月十五日终之”之语，可见，永禄元年四月十五日，八十三岁的兴勳在道树寺为大家最后讲解了《语录》。与天文三年本相比，该本更为详尽，也订正了前本的若干错误。东京大学该藏本卷末有“以策甫和尚之正笔 列孙天安叟誉写焉”的识语，卷内有“大林寺藏本”印记。

①景聪兴勳：《虚堂录抄》，第1167页。

②上述诸位僧侣的基本情况如下：一山一宁（1247-1317），台州（今属浙江）人，临济宗顽极行弥法嗣，相继住持今浙江舟山祖印寺、普陀寺，元大德三年（1299）受命出使日本。先后住持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净智寺及京都南禅寺，受到皇室贵族及上层武士的皈依，有《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语录》行世，门派称“一山派”。约翁德俭（1245-1320），今日本镰仓人，赴日宋僧兰溪道隆法嗣，在宋参学八年，镰仓长胜寺开山，历任京都建仁寺、南禅寺住持，有《佛灯国师语录》存世。日峰宗舜（1368-1448），京都人，日本临济宗僧无因宗因法嗣，今爱知县瑞泉寺开山，因复兴毁于战乱的京都妙心寺，被尊为妙心寺中兴之祖，后住持京都大德寺。义天玄承（1393-1462），今日本高知县人，日峰宗舜法嗣，历任京都妙心寺、大德寺，开创京都龙安寺、丹波龙兴寺。雪江宗深（1408-1486），今日本兵库县人，义天玄承法嗣，先后任京都大德寺、妙心寺住持，培养了被誉为“四杰”的优秀弟子，为妙心寺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悟溪宗顿（1416-1500），今日本爱知县人，雪江宗深法嗣，相继担任大德寺、妙心寺住持，著有《虎穴录》。玉浦宗珉（？-1519），京都人，悟溪宗顿法嗣，大智寺（在今岐阜市）开山，后住持妙心寺。

③《虚堂录抄》，永禄元年本之抄本，凡五册，抄写者为身份不明的“天安叟”，抄写时间不详，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学部图书室藏。

策甫和尚即曾担任京都妙心寺住持的策甫宗胜(? -1596)。日本有多处寺院称作大林寺,属于临济宗妙心寺派者至少有三家,此处的大林寺应该是其中的一家。

此外,根据古田绍钦的研究,与《虚堂录抄》同出一辙的抄物还有: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学部图书室另一种抄写时间及抄写者皆不明的藏本(仅存一卷,上有“大林寺藏本”钤记),原藏东京大学的四册本(今所在不详),驹泽大学图书馆藏节选抄本《虚堂颂古景聪臆断》一册,大阪府立图书馆藏《〈虚堂录〉臆断》五册本(上有“骏府宝泰寺什物”墨书)等。宝泰寺位于今静冈县静冈市,为临济宗妙心寺派禅寺。这些抄物有的是《虚堂录抄》的传抄增订本,有的则是兴勘听讲者的听讲记录。此现象也反映了《语录》颇受日本禅林的欢迎,至少在妙心寺派寺院中广为流传。

四、《虚堂和尚语录》在江户时代的刊行与研究

日本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开创幕府,日本历史进入江户时代。这一时期,幕府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平民教育普及,以町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此同时,在幕府奖励学问的政策下,佛教各宗纷纷建立了佛教研究和教育机构,先后出现一些著名的学问僧。就临济宗而言,五山派高僧依然得到幕府的重用,林下派中的大德寺派和妙心寺派因为得到德川将军家的支持而发展壮大,在民间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一)《语录》的刊刻与出版

江户时代以前,虽然出现了五山版刻本,写本依然是主流。江户时代以后,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活字印本与雕版刻本逐渐取代写本,以营利为目的的专业书商开始出现,出版事业随之繁荣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语录》的多种版本,包括古活字本和雕版刻本。

1. 古活字本

文禄元年(1592),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其间,将朝鲜大量铜活字、活字模具和铸字工匠掠回日本。这一行为,直接促进了日本活字印刷术的发展,表现为“古活字本”的流行。所谓“古活字本”,特指日本文禄、庆长年间(1592-1615)到宽永时代(1624-1643)末期日本排印的活字本,与朝鲜不同的是,日本使用更多的是木活字,而非铜活字。目前已知的《语录》古活字本有如下两种:

一种是庆长年间本。出版时间为庆长年间(1596-1614)后期,出版地与出版者不明,内容同正和二年五山版。版本信息如下:四周双边,有栏,每半叶八行十七字,版框 22.7×17.0cm,白口,双黑鱼尾,版心有“虚兴圣”“虚报

恩”等字。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有足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残本。全书原本为四册,不分卷。笔者推测,不分卷的作法可能是参考了南宋早期的刻本。驹泽大学藏本将原来的四册本改为八册本,卷内有“远江州龙谷禅寺新居驿”铃记。龙谷禅寺位于静冈县浜名郡新居町东湖山,属临济宗妙心寺派。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缺第一册,其余各册也有缺页和补写的内容。卷内有“浪花龙珠”铃记,可知曾为龙珠寺(位于爱知县名古屋,临济宗妙心寺派)旧藏。

另一种是庆长元和年间本。排印时间略晚于前一种,出版地与出版者不明,内容同正和二年五山版。版本信息如下:四周双边,无界,每半叶八行十七字,版框 20.0×14.0cm,小黑口,双花鱼尾,版心有“虚兴圣”“虚报恩”等字。四卷。笔者判断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本中,有三部属于这一版本,分别为七册本、五册本和一册本。七册本题签“虚堂录”,扉页有墨书“骏州长福寺什物”七个字,可知为今静冈县静冈市长福寺(临济宗妙心寺派)旧藏。该版本同时见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五册本题签“虚堂和尚录”,将七册本中的册1、2,册3、4分别合为一册。卷内有“芬陀利华院”“古桑山房图书记”“小汀文库”“龙奘”“驹泽大学图书馆”等铃记。每册扉页有墨书“室津见性寺”或“见性寺”几个字,可知为今兵库县たつの市见性寺(临济宗相国寺派)旧藏。一册本为残本,仅存第四卷径山、偈颂、小佛事、秉炬、法语、真赞、新添相关内容。扉页墨书“清泰藏本”四字,卷前有“冈田真之藏书”印,卷尾有“备前冈山城清泰院藏书”“清泰”铃记,可知为龙峰山清泰院(位于今冈山县冈山市,临济宗妙心寺派)旧藏。

2. 雕版刻本

宽永年以后,活字印刷逐渐沉寂下来,雕版刻本重新成为主角,至江户时代结束,《语录》又经历了几次重刻,至少形成以下三种坊刻本:

(1) 宽永九年坊刻本

宽永九年(1632)九月中野市右卫门刻印。中野市右卫门(?-1639),京都人,名道伴,号丰雪斋,曾随东福寺禅僧文之玄昌(1555-1620)习禅,被认为是京都书商之祖。出版有文之玄昌点校本《四书集注》、《南浦文集》等儒学典籍和亲自点校的《伤寒六书》等医书及大量佛典等。

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有藏。四卷,七册。全书卷尾有“宽永九年壬申九月中野市右卫门刊行”牌记。从内容和版式来看,应以庆长元和年间活字版为底本。

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本封底里页右下角有“宗安寺什物 昌山代”八个字,表明该本曾是宗安寺(位于今高知县高知市,属临济宗妙心寺派)藏本。卷尾有“电庵”“英迅”铃记。国立公文书馆本有“林氏藏书”“江云渭树”“昌

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等铃记,反映了该本经林罗山、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内阁文库递藏的历史。

(2) 正保四年坊刻本

正保四年(1647)正月中野小左卫门刊印。中野小左卫门(?-1662),京都人,名道也,号丰兴堂,中野市右卫门的弟弟,江户前期著名出版商,出版书籍包括儒书、医书、物语、和歌、假名草子等,尤以佛书为主。

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等处有藏。四卷,七册,卷尾有“正保四年丁亥正月中野小左卫门刊行”牌记。从内容和版式来看,该本为宽永九年本的翻刻本。

(3) 庆安三年坊刻本

庆安三年(1650)堤六左卫门刊印。堤六左卫门生平不详,唯知为京都书商,出版过不少佛教典籍。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有藏,卷末刊记曰:

《虚堂和尚语录》七卷,当初板行以弘于世矣,然转写误豕亥、剩差脱惟伙,今般以正本添削,便命工镂梓焉。时庆安三庚寅年仲春良辰。

寺町通二条上町堤六左卫门开板

刊记中提到《语录》七卷,而据笔者的调查,《语录》并无七卷本,只有庆长元和年间活字本有四卷七册本,而此版的内容与版式皆同庆长元和年间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堤六左卫门是以庆长元和年间版为底本刊刻了此版《语录》,刊刻理由是为了纠正《语录》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转写错误及疏漏等。

(二)《语录》的整理与研究

如前所述,早在室町时代,就有人为《语录》作训释。到了江户时代,一方面,幕府奖励修学,要求僧人专心研究教义和修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儒学界,还是在佛教界,对典籍的训释考据蔚然成风,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出现了颇多《语录》考释著述。据“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日本古典籍总目録データベース”(http://base1.nijl.ac.jp/~tkoten/)和《国书总目録》提供的数据,明确完成于江户时代的著述还有《虚堂和尚语录钞》(1653年)、《虚堂录故事》(1660年)、《头书校正虚堂和尚语录》(1669年)、《虚堂和尚颂古讲》(1689年)、《虚堂和尚颂古评唱》(1704年)、《虚堂录犁耕》(1727年)、《虚堂录法语代别抄》(1723年)、《虚堂录代别》(江户中期)等,这些著述通过对《语录》的注释、校勘、考订,以更符合日本人阅读习惯的形式呈现出来,方便读者学习和理解。兹介绍三部如下:

1. 龙溪宗潜《虚堂录抄》

龙溪宗潜(1602-1670),俗姓奥村,京都人,号大宗正统禅师。初习真言密教,后学禅宗,受伯蒲慧稜(妙心寺派)印可。元和六年(1620)住持摄津国普门寺(在今大阪府高槻市),庆安四年(1651)住持京都妙心寺,受紫衣,向

僧众讲解佛教经论和禅宗语录。不久退隐摄津国普门寺。承应三年(1654)明代高僧隐元赴日后,邀请隐元住持普门寺,并协助他在京都宇治开创了黄檗山万福寺。宽文三年(1663)受隐元印可,改法讳为性潜,成为黄檗宗僧。有后水尾法皇作序的语录《御版宗统录》存世。

承应二年(1653),宗潜完成了《虚堂录抄》,又名《虚堂禅师语录义事》《虚堂和尚语录钞》。在这部书中,宗潜对《语录》字词、文意做了十分详尽的解释。宗潜在该书的长篇序言中称:“读此全录,一一消归自己,言言冥合真心,审而思之,依而行之,则自利利他,细大规模,无所欠缺,譬如穷儒登群玉之府,无不称心满意,岂不快乎!”强调《语录》对修禅者开悟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宗潜对当时“法久而成弊,郑卫并起,正音无闻,宗习者取据于近代,无本于古风,故此录虽存,此法不行”的现象颇感担忧,提出“则无如将此录为师友,有志之士,不拘于时,切急努力,可以振已坠之法道,改近世之混滥矣”,表达了希望僧众通过研读《语录》实践正法的愿望。最后,序言还提出自己的注释是“考之古书,订之耆宿”^①。从宗潜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当时佛教界的现状颇为不满,这应该也是他日后支持赴日高僧隐元创立黄檗宗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万治元年(1658),村上平乐寺将宗潜的《虚堂录抄》付梓出版,题为“虚堂禅师语录”。村上平乐寺,今京都平乐寺书店的前身,创办于江户初期的庆长年间,创办者是武士出身的京都书商村上净德(?-1626),以出版佛教典籍为主。大正二年(1912)村上家将平乐寺转给井上治作后,更名为“平乐寺书店”,经营至今。

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有该本藏本,十卷,十六册。全书卷尾有“万治元戊戌稔八月吉祥二条通王屋町村上平乐寺开板”牌记,另有墨书“十六卷内一元寺”、“南明山一元禅寺现住太叟新添”等。卷首有“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大正十三年四月七日松平直亮氏寄赠”铃记。可见,该本最早被南明山一元寺(今山口县山口市两足寺,临济宗寺院)住持购入,后传入出云(今岛根县)松江藩主松平家,1924年被松平直亮捐赠给现东京大学图书馆。

2.《头书校正虚堂和尚语录》

宽文九年(1669),京都出版商堤六左卫门出版了《语录》的释校本《头书校正虚堂和尚语录》。据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全书十卷,十册,卷尾有“宽文九己(己)酉年九月仲浣日 寺町二条上町 堤六左卫门板行”牌记。释校者不详。在形式上,与之前的注释本颇多夹注不同,该本《语录》原文和注释文相对独立,在保持《语录》内容连贯性和完整性的同时,注释内容也因突

^①龙溪宗潜:《虚堂录抄》序,万治元年(1658)刻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

破空间限制而更为详细。纵观全书,说是“头书”,板框左右两边空白处乃至整页皆为注释的情况也不少见。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有多册的封底墨书“円光寺”,可知曾为京都圆光寺旧藏。圆光寺由德川家康于庆长六年(1601)创建,属临济宗南禅寺派系统,是江户时代著名的活字版“伏见版”的刊印地,印刷过大量包括儒学经典在内的和汉典籍。

此外,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内有一刊记为“宝永五年戊子初冬吉日书林”的十卷五册本《语录》,内封面亦书“头书校正虚堂和尚语录”。与宽文九年本比较后发现,虽然两者在细微处有区别,例如,宽文九年本中“虚堂和尚新添终”一行字有框,宝永五年(1708)本无,但是,两者在字体、行款字数、版框大小、边栏、版口鱼尾乃至内容等方面几乎一致,考虑到江户时代书商存在着翻刻它店畅销之书的现象,我们推测宝永五年本为宽文九年本的翻刻本。该藏本卷首、卷内分别有“大正十二年十二月九日西山五郎氏寄赠”“西山藏书”钤记,交待了该藏本的由来。

3. 无著道忠《虚堂录犁耕》

在《语录》的研究上集大成者,当推无著道忠的《虚堂录犁耕》。

无著道忠(1653-1745),又号照冰堂、葆雨堂。但马国(今兵库县)人。嗣法京都妙心寺龙华院竺印祖门(1610-1677)。宝永四年(1707)、正德四年(1714)、享保七年(1722)三度担任妙心寺住持,享保八年隐退。潜心学问和著述,是一位涉猎广泛、博学多识的著名学问僧,遗著多达三百七十四种,九百十一卷,其中,《禅林象器笺》二十卷,广引内典、外典对禅林用语进行训诂考释,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性禅宗辞典。当代著名学者柳田圣山曾对道忠的学问做过颇为细致的研究,总结了他在文献校勘、训诂、俗语研究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和重要贡献,称赞他是“在整个佛教史乃至东方人文史上留下最大功绩的学者之一”^①。道忠的禅学研究大致包括禅语辞书的编纂和对汉译佛典、佛学著作、禅宗语录的注释、考辨两大类^②。其学问“与‘述而不作’的中国训诂传统一派相承”^③，“其著作的最大特征,是对各种典籍作征文考献,从语言角度予以训释”^④。入矢义高注意到道忠所在的时代正好是清朝的考据学即将迎来高潮的时期,但是,他并不认为道忠的学问取范于清朝的

①柳田圣山撰,董志翘译:《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董志翘编:《中古文献语言论集》,巴蜀书社,2000年,第400页。

②雷汉卿:《日本无著道忠禅学研究著作整理与研究刍议》,《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六辑,巴蜀书社,2013年,第83页。

③柳田圣山撰,董志翘译:《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第407页。

④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5页。

考据学^①。张伯伟认为,道忠的为学取径,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和当时日本儒林崇尚博学的风气,以及诗坛对诗歌中词汇的训释和使用的讲究这一倾向有着内在的关联^②。

《虚堂录犁耕》凡三十卷,创作于享保十二年(1727)三月到十四年八月期间,历时三十个月^③。入矢义高指出,无著道忠在享保五年或之前的享保元年,曾应妙心寺的请求连续作了两次有关《语录》的说法,之后的享保十六年正月到十二月,他每个月都在讲解《语录》,次年的正月到八月,他再次作了讲解^④。可见,道忠对《语录》是极其熟悉的。

关于道忠注释校勘的方法,柳田圣山指出,道忠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解释佛典,他使用的是“收集用例、确定来源、订正前人谬误、补充不足的训诂方法”,“通过追溯原典来解释禅录中含有的疑难语句”^⑤。王长林将道忠训释的具体方法归纳为审音辨字、钩稽故训、异文互参、排比归纳、语境求义、方言参证等六个方面^⑥。上述方法在《虚堂录犁耕》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王长林还对《虚堂录犁耕》俗语词训释的成就进行了研究,认为道忠利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从文献学、禅学和语文学的角度对《语录》逐句注解,考释了一大批俗语词,成绩表现在“关注俗语,扼要释义”“记录古解,祛疑解惑”“批判旧说,自立新解”“披寻理据,深入探源”等四个方面,罅漏主要在“囿于字形,望文生训”“征引旧说,未予审辨”“释义随性,缺乏例证”等^⑦。

如前所述,在道忠以前,已有多部《语录》的注释书,那么,对于前人的注解,道忠又是何种态度呢?入矢义高指出,道忠虽然也引用这些旧注,但主要是对其中的错误加以批判,有时也会在批评之后再提出自己的说法,身份不明的逸堂和龙溪宗潜是道忠的眼中钉,两人所作的《虚堂录》抄物常常成为道忠痛击的对象,道忠对他们很少肯定,总是像对待错误的样板似地把他

①入矢义高撰,邢东风译:《无著道忠的禅学》,《佛学研究》1998年第7期,第102页。

②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第7-8页。

③《虚堂录犁耕》卷末题识曰:“《虚堂和尚语录犁耕》三十卷,享保十二岁次丁未春三月朔旦执毫,到十四岁己酉秋八月二十八日午时方竣事。”

④入矢义高,邢东风译:《无著道忠的禅学》,第104页。

⑤柳田圣山撰,董志翹译:《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第427、430页。

⑥王长林:《日僧无著道忠禅宗俗语词训释方法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七辑,中华书局,2018年,第45-65页。

⑦王长林:《日僧无著道忠〈虚堂录犁耕〉俗语词训释平议》,《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六辑,中华书局,2017年,第198-210页。

们当枪靶子打^①。我们在对《虚堂录犁耕》进行阅读时也发现了道忠对两人毫不留情地批判。因原妙心寺住持龙溪宗潜脱离妙心寺派,改归黄檗宗派,道忠在《黄檗外记》中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不过,柳田圣山认为,《虚堂录犁耕》中的批评只是学术性的推敲^②。在对同时代的两位僧人进行抨击的同时,对元朝赴日僧人一山一宁的注释,道忠却是“不加批判地引用”,“一味相信一山的释词,其中稍欠批判性的事例也明显可见”^③。个中原因,尚需深究。

道忠在《虚堂录犁耕》序中还对《语录》缺少序言一事作了如下解释:“此录无序,以为阙典。盖师出世于蒙古骚乱之际,唱灭未几,赵宋亡,以是诸徒不暇请大手笔作序蒙编,幸此录传于日本,盛流行而已。”^④

与道忠的大部分著述一样,《虚堂录犁耕》并未刊刻流布,唯有手稿存世。在著作出版之风极为盛行的时代,道忠为何要放弃出版呢?柳田圣山认为,“这体现了他是一个真正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表明了他的学问还将不断发展”,他是“为了等待身后真正的知己”^⑤,在当时,能理解他学术思想的人应该是寥若星辰吧。

日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编辑出版《基本典籍丛刊》,包括1990年问世的《虚堂录犁耕》。据该书解题,此书为妙心寺龙华院藏道忠手稿的影印本。

五、结语

目前通行的《虚堂和尚语录》是虚堂智愚中日两国弟子、法孙历时半个世纪,三次编纂,共同完成的成果。形成初期,《语录》并未分卷,咸淳五年再刻本确定为四卷。传到日本后,出现了四卷本和十卷本两种形式。四卷本为《语录》早期的版本,包括“卷上”“卷中”“卷下”“后录”四卷。江户时代庆长元和年间古活字本出现了四卷七册的形式,由于江户时代的坊刻本基本是以庆长元和年间本为底本,于是,七册本成为江户时代《语录》的主要形式,在后代的著录中,因此出现了“七卷”的误说。十卷本可能起源于《语录》抄物,因其中夹杂大量注解,内容增多,卷数遂由原来的四卷扩充到十卷。大正元年(1912)《大日本续藏经》(前田慧云编,藏经书院出版)收录的《语录》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没有注释的十卷本,后来颇为流行的《大正新修大藏

①入矢义高,邢东风译:《无著道忠的禅学》,第104页。

②柳田圣山撰,董志翹译:《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第424页。

③入矢义高,邢东风译:《无著道忠的禅学》,第102页。

④无著道忠:《虚堂录犁耕》,禅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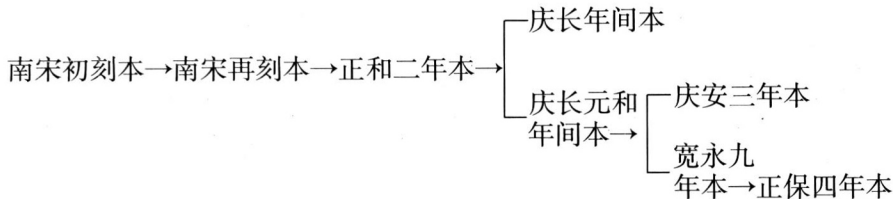
⑤柳田圣山撰,董志翹译:《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第419、420页。

经》版《语录》亦是十卷本,目前通行的十卷本多源于此。

在中国,《语录》的流传并不久远,似乎也未得到广泛的阅读,最终至于散佚。在日本,《语录》在延绵不断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翻刻本和训释本,而且,我们看到的几乎每件藏本,都有阅读者留下的训点和以头书、旁注等形式施加的注记,说明它在日本禅林流传与接受的深度和广度。《语录》在中日两国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同,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与智愚法脉在中日禅林的发展状况有关。在中国,智愚的弟子中虽然也出现了灵石如芝这样的名僧,但是,如芝之后却再未出现有影响力的弟子;在日本,南浦绍明法脉形成的“应灯关派”以大德寺和妙心寺为中心不断发展壮大,是临济宗的主要流派,在幕府上层和民间皆有很大的影响力,未负智愚对绍明“东海儿孙日转多”^①的深切期待。从藏本所在寺院的派别和注释者的身份来看,《语录》最主要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还是临济宗,尤其是“应灯关派”的僧众,这与日本佛教重视法脉相承的传统有关,是“应灯关派”重视学问、枝繁叶茂的结果,也是江户时代宗学(研究本宗祖师教义思想为主)发达的表现。

张伯伟认为,域外汉籍的价值“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不只是‘吾国之旧籍’的补充增益。它们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的‘异域之眼’”^②。《语录》在日本的翻刻本和考释本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它们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地重视,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发掘和利用。

附:《虚堂和尚语录》版本关系图



【作者简介】江静,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李丹,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2016 级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

①妙源等编,陈雷整理:《虚堂和尚语录》卷之十《送日本南浦知客》,第 4884-4885 页。

②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0 页。